

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教育理念

黄俊杰, 孙震

(台湾大学 历史系; 台湾大学 经济系)

摘要: 本文以傅斯年未两年的台大校长任内之改革理念及措施作为中心, 分析傅斯年之大学理念、改革原则及其具体作为, 指出傅斯年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近于欧洲的大学之典型, 但是其改革原则特别着重本国之具体社会文化脉络, 并强调专业训练与通识教育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 傅斯年; 台湾大学; 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68(2005)01-0094-04

Fu Si-nian and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Taiwan University

HUANGJurrjie, SUN Z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Fu Si-nian used to be President of Taiwan University. The paper analyzes his idea of university; principle for reform and practices in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t intends to tell the readers that though his idea of university is very much close to the European model but in acted reform,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in indigenous culture and social context.

Key words: Fu Si-nian; Taiwa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idea

傅斯年 1896 年生于山东聊城的书香门第, 七世祖是清代入关后第一个状元。他自幼在祖父指导下熟读经史典籍, 1919 年在北大求学时就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之一, 其后负笈英国与德国, 广泛接触

各种新学术。1928 年年底他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引领当时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1949 年傅斯年桴海来到台湾, 1 月 20 日就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 在台大全力推动改革。1950 年 12

收稿日期: 2004-09-18

作者简介: 黄俊杰,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共同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员。

孙震, 台湾大学前校长, 台大经济系名誉教授, 元智大学管理学院远东集团讲座教授。

傅家故居大门两侧对联: “傅姓名无双士, 开代文章第一家”, 颇能道出傅家门风。

台湾大学前身系台北帝国大学, 创立于 1928 年, 有关创立台北帝国大学重要公文等史料, 均收藏于日本东京之国立公文书馆。2004 年 4 月台大图书馆已将这批史料影印回台, 并录制光盘片储存。1945 年 10 月 25 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以后, 台大第一任校长系罗宗洛(任期系 1945 年 11 月 15 日至 1946 年 5 月, 5 月校务由校务委员会维持至 8 月), 第二任校长系陆志鸿(1946 年 8 月至 1948 年 5 月), 第三任校长系庄长恭(1948 年 6 月至 1949 年 1 月), 傅斯年于 1949 年 1 月就任第四任校长。关于早期台大历史, 参看黄得时:《从台北帝国大学设立到国立台湾大学现状》,《台湾文献》第 26~27 卷 41 期(1976), 第 224~245 页; 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学制发展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 收入氏着:《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 稻香出版社, 1991); 欧素琪:《光复初期的国立台湾大学》,《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24 期(1998 年 6 月), 第 51~90 页。台湾光复之初, 原“台北帝国大学”之名曾有人主张改为“国立台北大学”, 1945 年 11 月 10 日, 教育部以高字第 57333 号公函, 提请行政院院会讨论将“台北帝国大学”更名为“国立台北大学”, 但经 1945 年 11 月 20 日行政院第 721 次会议决议名称应改为国立台湾大学, 行政院秘书处并于 11 月 24 日以公函复知教育部。2003 年教育部以台高(二)字第 0910192456 号函行文台大, 检附 12 月 15 日高字第 63242 号代电通知“台北帝国大学经部提请行政院会议改为国立台湾大学已决议通过合电知照”之公文, 可见 1945 年台大系由“台北帝国大学”直接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国立台北大学”并未正式定名。以上资料已由台大图书馆在“国立台湾大学第 2275 次行政会议, 贰. 报告事项”中报告并列入记录。

月20日下午1月20分,他在答复台湾省参议员对台大校务的询问时,以脑溢血逝世于台湾省参议会会场。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只有一年又11个月,但是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却为台大留下可观的精神资产,在21世纪海峡两岸大学院校都大幅推动教育改革之际,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一、傅斯年的大学之理念

傅斯年关于大学之理念,最完整的表达是他在1950年12月18日完稿的《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这篇长文中,距他在12月20日以脑溢血逝世仅二日。这篇长文分上下二篇刊于《大陆杂志》第1卷第11及第12期,全文纵论中国各级学校教育改革之构想,其中涉及大学教育的文字甚多。

大体言之,傅斯年主张专科学校应以职业训练为目的,但也应有其学术训练,犹之乎大学应以学术为对象,但也应兼顾职业训练。专科学校与大学之截然不同,在于下列几点:(1)大学必经预备学校,专科则不然,所以预备学校与专科学校学生年龄相近。预备学校期限两年,专科学校四年,但工农专科的应用科则可以五年为期。(2)大学以每一种学科的基础训练(多为理论训练)为主,专科则以每一种科目的应用为主。(3)大学生在入学之始,至少在第一年级以后,即须能阅读外国专门书报,专科则求其毕业时达此目的,所以专科学校用书应编译。(4)大学的实验常是解决问题的实验,较少练习手技,因为在大学的预备学校已先练习成物理、化学、生物切片或看镜子等等技巧了,但在专科学校则一切实验除了解原理的少数以外,以练习工作技巧为原则。^[1]傅斯年特别强调大学教育应特重以下四项要义:

- 1、大学不可糅杂职业学校的目的。
- 2、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专科学校以应用为本位。
- 3、大学的教学必须与专科学校不同。专科学校不应模仿大学,而且大学的多数部门也不过是专科的程度,偏又不能做到专科学校的实践性。
- 4、大学毕业的任用资格除在大学或研究机关之外,不应优于专科学校。^[2]

从上述有关大学与专科学校之区分的言论看来,傅斯年心目中的大学基本上比较接近纽曼大主教(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或弗雷克斯纳(Abraham Flexner, 1866~1959)心目中的20世纪初期的大学之形态^[3]。这种欧洲型的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

与就业导向的专科或职业学校有本质上的不同。

傅斯年从上述大学的理想形态出发,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中国的大学只不过是国外大学形态的杂凑而已,缺乏自己的特色。傅斯年说:

中国的大学,创设在清朝末季,当时管学大臣所“奏定”的“学堂章程”,有“分科大学”一项,这里面包括经、法、文、理、医、工、农、商等科,这个制度可以说大体是抄自日本的,而日本的制度,又大体是抄欧洲大陆的,尤其是普鲁士。北京大学,就是照这个章程办的一个大学,也是当时仅有的一个国立大学,不过当时客观的条件,并不具备,所以办的不伦不类,这是清朝光绪末年的话。到民国初年,美国影响来了,自南而北,即自所谓江苏省教育会发动,教育制度从大学到小学,一齐受这影响,因而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原来的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德日的躯壳之内加上了一个美国的肉体,所以中国大学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产物,非常特别,不过这个特别实在是一团乱糟糟而已。^[4]

针对20世纪中国大学的这项弊病,傅斯年强调包括大学在内的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不应盲目抄袭外国学校之制度,应注意本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5]

二、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则及其在台大的作为

傅斯年自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之后,面对战后百废待举的台大,全力投入台大的改革。他的侄子傅乐成(1922~1984)教授对傅斯年当年的工作,曾有第一手的证言:

他对校务,几乎是无事不做。校长办公室的秘书那先生,住在我家中,时常被半夜里叫起来处理校务。这种办法,平时即连家中人都不大赞成。他那种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6]

傅斯年对工作的狂热,在他领导台湾大学时全幅展现,除傅先生个人的人格特质之外,与1949年退处台湾的时空情境也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傅斯年在1950年所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岛上,正是检讨过去一切的时候,正是我们出问题给自己的时候。”^[7]在这种窘迫的历史时空之中,傅斯年推动了台大的教育改革。

(一) 教育改革的原则

傅斯年在台大的教育改革并非任意为之,他对教育改革有其一套原则。我们试加归纳,约有以下

五点:

1. 在计划教育与自由发展之间求其均衡。傅斯年本此原则主张:(1)学校应循分层推进的道路求其多元化。(2)同样的学校不必只许有一个形态。(3)都市和乡村的学校不必用同样的章程。(4)异地的学校不必采取一致的办法。^[8]

2.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其平衡。傅斯年认为,如果一切根据现实订定学校制度,便难以进步;但如果全凭理想,则又不能实行,所以学校方案必须兼顾理想与现实。各级各类学校应有不同的理想,然而综合来说,大原则是使得人像人,人能生活,人能生产,人能思想,人人助社会,社会助人人。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是贫穷与愚昧,因此学校制度的改革应在高举理想之时不忘现实情况。^[9]

3. 在传统与改革之间求其平衡。傅斯年主张,教育改革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为传统而预做适应之计。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两大项:工业化与大众化。中国非工业文明的教育内涵与中国传统文明之忽视大众,必须加以修正。^[10]

4. 在技能训练与通才教育之间求其平衡。傅斯年认为,中国为克服困穷及增加生产,技能教育必须重视,但是因为技能日新月异,所以人必须与时俱进,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就出来的人将成为死板而不能自求进步的机器,如此不久之后,技能随时代进步而人则落伍成为废物,所以“通才”这一个观念,在教育上必须与技术同等重视。^[11]

5. 在教堂与市场之间求其均衡。傅斯年认为,学校可以是一个近代主义的教堂,使受教育者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但学校也可以提供某种技能或生产教育以增进大众之福祉。^[12]

傅斯年主张各级教育应该在“计划/自由”、“理想/现实”、“传统/改革”、“技能/通才”、“教堂/市场”之间,求其动态的均衡。这些原则也大多落实在傅斯年对台大的改革措施之上。

(二) 台湾大学的改革策略

傅斯年在不到两年的台大校长任内,推动了许多改革策略与措施,其中较具关键性的有以下四项:

1. 大学精神的重建

傅斯年接掌台湾大学,第一件事就是将日本殖民政府时代深具工具性的台北帝国大学改造成为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学。他对全校师生宣示:

日本时代这个大学的办法,有他的特殊目的,就是和他的殖民政策配合的,又是他南进政

策的工具。我们接收以后,是纯粹的办大学,是纯粹的为办大学而办大学,没有他的那个政策,也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由日本的台北帝大变为中国的台湾大学,虽然物质上进步很少,但精神的改变,意义重大。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的目标。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自然应该拿今天作我们的校庆。^[13]

傅斯年揭示了他的办学宗旨:“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这一段宣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针对性。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由日本殖民当局创立于1928年4月,设文政学部与理农学部;1936年1月,增设医学部;1937年4月,原台北医院改制为台北帝大医学部附属医院;1939年增设热带医学研究所;1943年3月,增设南方人文研究所与南方资源科学研究所。台北帝国大学之设立,原始目的系为配合日本帝国向南洋各地之侵略,作为日本帝国“南进政策”之学术基地。筹设台北帝国大学之中心人物、后来出任台北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币原坦(T. Shidehara, 1870~1953)曾强调台湾是日本帝国前进南洋之据点,在人文及自然科学研究上均具有重大价值。^[14]正因台北帝国大学之设立目的极具工具性,所以,设校之议初起之时,台湾士绅及社会有识之士均群起反对。台北帝大设立之后,确实也以南方人文资源科学研究及热带医学研究为其主要方向,而且台籍学生极少。

傅斯年针对台北帝大之工具性角色而痛下针砭,呼吁大学应重其自主性,并提出“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与台大师生共勉。他引用斯宾诺莎的名言——“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更是铿锵有力。

2. 通识教育的加强

傅斯年的教育改革原则非常强调在专业的训练与通识(他称为“通才”)教育之间应取得平衡。

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台大校训,原文作“力学”二字,但现在台大正式的校训文字均作“励学”。

他接掌台大之后,有感于台北帝大之工具性过强,所以特别加强大学通识教育,对于大一共同必修科目的教育尤其重视。傅斯年说:

我大胆向诸位先生提议,我们要在一年半之内,集中精力,改进本校各种通习科目,建设本校的教育制度,务使来校的学生,一进大门来,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教课之需要实习者,得到充分的实习机会,有富于教本参考书的阅览室可用,有优良的助教改他们的卷子,国文和外国文的程度,一年之内顿然改观。学生的求知欲,是应该加以鼓励的。

.....

以上所说的一般通习科目,包括在文学院的国文、英文、通史、逻辑;在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地质;在法学院的普通经济学,法学通论等。为充实这些一般课程,还要增聘不少的教授,这个办法,与其谓为充实文理两学院,毋宁谓为充实全校六个学院的基础课程。^[15]

傅斯年在校长任内特别重视大一“国文”、“英文”、“通史”、“数学”、“化学”、“物理”等共同科目,并常常亲自参加大一共同科目的教学会议。

傅斯年对台大通识教育的重视,与他本人的博雅学识深具关系。傅先生同时代的友人或同事,对他的博学莫不称誉有加。蒋梦麟(1886~1964)说:“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下。”^[16]程沧波(1903~1989)则说:“关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他够得上‘博大精深’四个字。”^[17]屈万里(1907~1979)曾转述,傅斯年参加讨论大一数学课程的会议之后,当时台大工学院院长彭九生对傅斯年佩服不已。^[18]傅斯年是一个典型的“五四人”,处事大有气吞万里之势,为学则通博远重于专精。他秉持五四精神,办学自然特重大一共同课程的教育。

3. 坚守学术专业,提升台大的师资水准

1949年之后台湾局势动荡,台大处于时代变局中,师资之聘任常受政治之干扰。傅斯年就任校长后,在答复当时的“反共专家”叶青的公开信中宣称:

台湾大学以前请教员甚滥,确是事实,但自我到任以来,提高标准,限制兼职,半年来进步甚多,现有国际知名之学者多人在内。我请教员,当然要依据标准,依据专业之精神,尤其是因台湾大学各院系之需要而定,我若把台湾大学作为“招贤纳士”之处,那真对不起国家了。招贤纳士与办学不能合为一事,国家要如此,可以另设机关,学校若如此,必糟无疑。^[19]

在傅斯年任内,台大辞退许多不称职的专兼任教师,甚至因而得罪若干权力人士,引来各种打击。1950年出版的《新闻天地》杂志,曾对当时傅斯年的处境有第一手的报导:

傅斯年先生长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遇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的困难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其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20]

这项报导中说傅斯年与“丑恶势力对垒作战”,与当时实情相去不远。傅斯年坚持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拒绝政治力量干涉学术,确实奠定了此后台大的自由学风。

4. 推动自由选课制度,发展台大各学院之特色

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之后,决定废除台北帝大时代之讲座制度。他认为,台北帝大的讲座制度是在一个教授之下附设一个研究室,这种制度源起于欧洲,但到19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近代大学的制度。傅斯年认为,1950年代台湾之时空环境都与19世纪的欧洲大不相同,专家与通才无法兼顾,而且学生素质也大不相同,凡此种种因素都使战前的讲座制度难以继续实施。^[21]在取消讲座制度之后,傅斯年为落实欧洲大学教学自由的精神,主张让台大六个学院依其学术特性而各自发展。各学院大一及大二修读必修课程,文法学院三四年级则充分选修,理、农、工、医等学院则参酌自由选课之精神排课,因为学生若无选课之自由,就不成其为大学。^[22]自由选课制度可视为傅斯年在台大校长任内落实学习自由的重要改革措施。

傅斯年在台大所坚持的学术自主、学习自由、各院系发展特色等等理念,在近半世纪台大的发展过程中,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扬。不但他与台大师生共勉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成为台大的校训,他所提出的“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之理想,更是成为台大人永恒的乡愁!

参考文献:

- [1][2][5][8][9][10][11][12] 傅斯年. 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A]. 傅斯年选集第10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 1746, 1749, 1525, 1754, 1756, 1758, 1761, 1761.

- [3] [英]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 徐辉、顾建新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西班牙]加塞特. 大学的使命[M]. 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美]弗雷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 [4] 傅斯年.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516.
- [6] 傅乐成. 先伯孟真先生的日常生活[A]. 傅故校长哀挽录[C]. 台北:台湾大学. 1951:13-15.
- [7] 傅斯年. 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A]. 傅斯年选集第10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704.
- [13] 傅斯年. 国立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573-1574.
- [14] 币原坦. 台湾の学术的价值[N]. 台湾时报, 1923-12.
- [15] 傅斯年. 国立台湾大学三十七学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校长报告[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490.
- [16] 蒋梦麟. 忆孟真[J]. 自由青年. 第8期.
- [17] 程沧波. 记傅孟真[J]. 新闻天地. 第156期.
- [18] 屈万里. 敬悼傅孟真先生[J]. 自由中国. 4卷1期.
- [19] 傅斯年. 傅斯年校长的声明[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497.
- [20] 周末随笔[J]. 新闻天地. 1950:105.
- [21] 傅斯年. 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535-1552.
- [22] 傅斯年. 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A]. 傅斯年选集第9册[C]. 台北:文星书店. 1967:1515-1526.

(责任编辑 李春萍 何方)

第15届大学行政人员国际会议在北大召开

第15届大学行政人员国际会议于2004年8月22~2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大学行政人员国际会议(IMUA)组织首次将其学术交流活动放在中国大陆举行。该组织成立于1981年,每一年半到两年时间举行一次国际会议,研讨和交流大学管理中出现的重要问题。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大学管理能力建设:把握机遇,驾驭风险”。来自世界上33个国家的200多名大学校长、教务长、行政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教育部章新胜副部长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参加了会议,并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此次会议将大学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作为主题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大学管理一种新的变化趋势。所谓风险是指对实现组织目标可能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的行动或事件及其出现的概率。风险可能出现在大学人事、财务、法律、学术、道德、声誉、商业、运行等各个方面。导致风险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及其速度;二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对于大学所寄予的期望;三是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日益激烈的竞争;四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五是国家的经济状况。风险管理就是专门针对风险进行的管理,风险管理的目的是要识别风险,从而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减少风险的出现及风险对组织的影响。对于未出现的风险来说,大学可以采取监控、降低和避免等措施;对于已经出现的风险来说,大学可以采取接受、分担和转移等措施。

会议交流期间,一些国外大学的代表介绍了他们风险管理的具体做法。大学风险意识的增强和对风险管理的关注,间接地说明大学管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水平。从国外大学风险管理的实践来看,已经开始在探索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通用的风险管理模式。随着我国大学与社会联系的加强以及环境变化的加速,大学管理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大学管理人员有必要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系统的建立。

(凤桥 讯)